

国家构建、新知识与自由职业社团：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例

江文君

[提要] 在既往对近代中国社会中间组织的研究中，有不少是应用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与解读的，然而将近代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比附作西方历史上的“公共领域”，以西方的历史演变模式作为一理想型来解释中国。这不啻是把一个具有西方起源的概念强加于一种异质的社会现实。所以本研究尝试采用一种新的理论范型——社会权力(social power)，作为理论分析的工具。并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例，探讨中层组织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上海这一城市的西化特质与现代部门的成长给予了会计师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而政府与会计师公会的关系则是复杂微妙的。一方面国民政府与会计师公会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国家构建与现代化导向。另一方面，致力于“以党建国”的国民政府需要将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向下延伸，展现出一种国家（精英）控制型公共性。

[关键词] 国家整合；中层组织；上海会计师公会；社会权力

在既往对近代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中，有不少是应用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与解读的，如罗威廉对汉口城市社团的研究。然而源自于西方文明历史发展经验的“公共领域”这一理想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近代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几乎所有应用这一理论范型的研究者都无法厘清近代中国自治性的“公共领域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显然将近代中国的社团组织比附作西方历史上的“公共领域”，以西方的历史演变模式作为一理想型来解释中国。这不啻是把一个具有西方起源的概念强加于一种异质的社会现实。^①

所以本研究尝试采用一种新的理论范型——社会权力（social power），作为理论分析的工具。^②按照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经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民社会的推动下，国家权力在不断地、逐渐地向社会让渡，由国家权力内部的分权，发展到国家向社会开放、分权。同时，由于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包括政党、非政府组织、公司企业、公益团体、不同利益群体组织等中层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成长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中层组织出现于市民社会，也代表了市民社会。^③社会权力也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分散化和强化。这一进程意即国家与

^①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源于古希腊城邦，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诸如广场、公共澡堂、戏院等。这一概念是与西方古典传统中以城邦为共同体的特定语境分不开的。而这一点似乎与传统中国以血族宗族为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差异明显。

^② “社会权力”（social power）这一概念来源于英国学者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他认为社会的历史即权力的历史；而权力则来自对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的支配。社会权力来源于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等 4 方面的权力，是由它们构成的互动网络。该理论令人耳目一新的展现了与国家权力相对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及其网络形态。此外，迈克尔·曼还考察了历史上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即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以及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区分。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即是一个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国家。村庄代表着中国悠久乡土传统的承载者，也代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组织制度形式和人际交往网络，是民间社会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基本上无法渗透、控制到村庄一级社群。而最多只能控制到县或者县城。因此与存在着强大乡村社会权力的乡里相比，中国的传统城市，尤其是县城，恰恰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最强的区域，是传统贡赋制帝国的行政中心。

^③ 中层组织理论是国际学术界近 20 年来所提出的重要理论范型。该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指一个政治实体中社会中层组织的总和。中层组织的作用是充当国家与家庭（个人）之间的中介。最近国际学术界的公民社会理论对发达中层组织的评价甚高，甚至将其视为构建良好公民社会，建立完备的中层组织网络体系从而分散、降低社会风险，以制衡国家权力的最好办法。

社会的分离。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恩格斯在论证国家起源时也指出：“国家从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①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引发了权力的多元化。权力已不限于国家所独占，在国家权力之外与它并存并行的还有社会权力。在近代西方国家，新的社会权力以“公共领域”的表现形式出现，这尤其体现在 17 世纪至 18 世纪出现于英国的咖啡屋、法国的沙龙、德国的读书会等公共空间。

西方社会权力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从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对应的视角而言，它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与之相比，传统中国的社会权力来源则不尽相同。与通常的想象不一样，传统中国有着丰富多样的民间社会与社会权力。传统中国乡村遍布家族祠堂和私塾，城市里也充满各种商会、行会和同乡会，各种宗教活动也比较自由。它们满足着来自民众的，政府顾及不到的多样化的公共需求，能使社会结构趋向和谐稳定。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民间社会意即胡塞尔与哈贝马斯所指称的“生活世界” (Lebenswelt)。^②在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在更大意义上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网络形态，进而达至一种微妙的平衡。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击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个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相同的……这种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③然而近代以来的剧烈社会变迁，使得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网络与社会权力分崩离析，这尤其体现在宗族制度的衰微、乡绅阶级的没落以及随之而来乡村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衰退。^④与之同时，与民族国家的建设相一致，新的社会权力在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沿海都市（上海等）逐渐产生。随着上海等现代都市的发展，新的都市社会群体纷纷结社，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逐渐演变成新的社会权力来源。晚清推动上海地方自治的地方绅商转变为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律师、会计师等现代专业人士。绅士传统则转变为由自由职业者，记者、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组成的组织协会。

现代国家是一个复杂社会的产物，作为一个日渐理性化的国家机器，现代政府乃是一高度科层制，专门化的机构，实乃理性架构的统治。所以现代国家的建设需要丰富的新知识能力。需要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来为“利维坦”服务。在国家构建的过程，作为新知识的承载者，诸如会计师、律师、医师等专门职业在近代社会有着越来越大的职业拓展空间。拥有新知识的职业精英努力与大众社会产生联系，他们既未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未丢弃自己的原则，新知识的功能既是用来改进现实社会、报效国家、也是为了实现自我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5 页。

^② “生活世界” (Lebenswelt) 是德国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晚年所提出的重要理念。是指与科学世界（理念世界）相对的“单纯的经验世界”。“生活世界”总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正具体的周遭世界”。因此“生活世界”是原本主体化了世界，是一个前科学的世界，而科学世界则是由此被赋予“科学”的世界。胡塞尔认为并非所有的文明都有科学的世界（事实上近代的科学世界是从欧洲产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传统文明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是历史—文化世界的复合体，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性实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 页。

^④ 甚至于是演变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一场场的社会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两三千年发展出来的民间社会的基础，一切民间自发的中层组织从宗族、宗教、学校，到行会、会馆、同乡会等所谓中间团体 (intermediate groups) 都被彻底铲除。

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伴随城市新职业群体而应运而生的社会权力——专业协会的发展历程与运作模式。并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例，探讨自由职业团体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正如歌德曾说过的：“个体是不可言传的（*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专业协会（中层组织）由于介于个人与社会之间，所以它既是两者的媒介又承担着联结公与私的责任。

一、上海会计师公会的创立

民国政府对于城市内的中间团体一直予以关注，并试图通过颁布相应的法规将其整合进国家体系内。例如早在 1930 年，在国民党当局的文件中，就已经将“自由职业团体”与“职业团体”明确区别开来，专指由律师、医生、会计师、工程师、记者所组成的团体。相应地，这些人也就被称为“自由职业者”。1934 年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人民团体指导办法，规定宗教团体、公益团体、自由职业团体、及其他特种社团之组织，除宗教团体准用文化团体法规外，有单行法规者依法进行，其余概依《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办理。1940 年后除一般规定外，大部分自由职业团体都有单行法规加以规范。^①显然自由职业者属于城市精英，国民政府迫切希望将这些具有新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纳入到国家构建之中。

注册会计师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自由职业，是由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中成长起来的。会计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它诞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然后扩散开来，成为当今标准会计的一部分。近代企业制度，譬如股份公司、公司法人、有限责任等的引入亦伴随着对资本核算需求的产生。随着现代会计方法在 19 世纪下半叶被引入中国，会计师群体也逐渐在一些西方机构如租界当局、外资公司中涌现，现代会计方法的引入和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出现，慢慢取代了中国传统的簿记和账房先生。^②

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作为一种新兴专门职业的中国会计师群体人数并不多，而且大多集中在上海。这一职业群体的人数是如此之少，以至一直到 1910 年代末，北京国民政府才逐渐开始注意到这一新社会职业。并期望加强政府管制、规范这一职业。1918 年 9 月农商部颁布了《会计师暂行章程》，承认并规范了作为专业人士的会计师职业。该章程规定会计师任职资格是必须年满三十岁，接受过至少三年以上的大学会计学专业教育，并在大型公司企业拥有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最后规定注册会计师必须在农商部注册，并由该部颁发会计师执照。^③《会计师暂行章程》的颁布标志着会计师的职业地位在中国首次获得了官方承认，同时也表明政府意图规范并掌控会计师这一新社会群体。现在看来农商部颁布“会计师暂行章程”十一条，规定十分简略，但对于资格限制则比较严，所以在 1921 年，徐永祚领到会计师证书时，先后不过 15 人。到了 1923 年，政府修正条例，将资格放宽，申请会计师的人才渐渐多起来。^④然而到 1925 年上海会计师公会成立的时候，成员亦不过 23 人。^⑤而此时据估计，全国会计师人数也不过 100 余人。

^① 张玉法编：《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上册，台北“国史馆”1998年版，第623页。

^② 与西方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中等以上专业教育的会计师群体相比，传统中国社会的账房先生大多没有接受过商业科目教育。传统的账房先生教育主要师傅带徒弟的学徒教育，更多的是一种经验的习成，而非技术的发展。

^③ 《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179页。

^④ 徐永祚：《中国会计师事业》，《会计杂志》1933年第2卷，第145页。

^⑤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备经过情形的报告及发起人名单筹备费收支帐及会议记录》，上海档案馆S447-2-7，第50页。

到 1925 年时，当时全国会计师人数一百四五十人。^①接下来的 1926 年时，全国领照会计师共 183 人，其中上海 55 人。^②

会计师群体的迅速成长，使这一职业群体逐渐型构了一个共同的职业共同体，产生了对自身职业地位的认同感。这尤其体现在 1925 年上海会计师公会的成立一事上。关于成立会计师公会这一想法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 1920 年代中期，该公会档案中曾明确记载：“同人鉴于文明各国会计师公会成效卓著。而我中国独付厥如，殊无以资同业之切磋琢磨向上进展。并促进经济事业之健全发达。于上年三月间征集同志共筹组织。”这一记载说明了组建会计师公会这一想法最早是在 1924 年 3 月开始发端。创建会计师公会的想法一经提出。迅即得到了其他会计师的热烈回应，随后的筹办事宜之开始经过则大致是，“上年四月二十日第一次会议发起人大会议定公会大纲，公推本席。并请徐广德君起草章程，经第二次发起人会议通过。呈部请准备案。至七月二十日第八次发起人会公决。每人出筹费银十元，设筹备处于本席事务所内。并举定吴应圆君及本席等九人为筹备员进行一切。”正是在 1924 年 7 月 20 日，徐永祚等 23 名会计师在上海的一家餐馆聚会，召开了第一次预备会议，“选举吴应圆君及本席等九人为筹备员”。^③次日，该公会收到北京政府农商部批示第 893 号，农商部训令写道，“查所报会计师公会章程五十二条大致尚合，惟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所称设总事务所与上海及经会员之议决得设分事务所各节恐兹误会。”在批示中北京政府农商部先是肯定了会计师公会筹备组所拟定的公会章程与政府颁布的会计师章程并无冲突，然而也指出该公会设想的在沪设总事务所与在各地设分事务所机制恐滋生误会，且不利于政府管理。农商部最后建议该公会“应将该条条文改正后再行核办”。一个星期后，该公会筹备会议在修订了该会章程后再次向农商部正式递交了准许成立公会的申请。

1924 年 8 月 4 日，会计师筹备员会致函公会的共同发起人，在信函中写道：“台端将所有对于章程应该修改之处于八月十二日前用书面提交筹备处以便召集提出发起人会议表决通过，特定于八月十三日下午五时在爱多亚路三十六号三楼筹备处开发起人会议。”^④待筹备员会对公会章程作了必要的修改之后，再次呈报农商部。

该公会筹备会议原先预计能很快得到北京政府的回复批示。然而随后爆发的江浙战争却延迟了上海会计师公会的成立，因而公会也不无遗憾的表示“江浙发生战事，绵亘数月，至令筹办事宜不得不暂时停滞。本公会之迟迟成立，此实为其一大之原因。”除了江浙战争的干扰之外，与之同时北京政府农商部也就公会章程的具体细节与会计师公会筹备会几番商讨交锋。如 1925 年 1 月 6 日的农商部批示第五号表示：据已查所报会计师公会修正章程，称将原文第一条内组织二字致上加在商海三字一节前似欠妥当。应将原章第一条内农商部核准以下各语改为在上海附近行使职务之会计师组织之名，曰上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其余大致尚合。^⑤农商部与公会筹备会就章程问题的数番交锋表明北京政府对上海会计

^① 徐永祚口述、张守让执笔：《中国会计师事业》，《会计杂志》1933 年 2 卷 1 期，第 145 页。

^② 《全国各地会员名录及发给会员证章名册（一）》，上海档案馆 S447-2-260。

^③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备经过情形的报告及发起人名单筹备费收支帐及会议记录》，上海档案馆 S447-2-7，第 50 页。

^④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筹备成立、议订及修正章程呈请农商部等主管官署备案的文及其批复和召开会议的通告》，上海档案馆 S447-2-230，第 17 页。

^⑤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筹备成立、议订及修正章程呈请农商部等主管官署备案的文及其批复和召开会议的通告》，上海档案馆 S447-2-230，第 60 页。

师公会的成立与组织一事十分重视，希望通过严格规范、限定将这一新社会组织纳入到政府规制之中，便于管理和控制。上海会计师公会原先设想的在上海建总事务所。在各地分设事务所的初衷，其意图显然是想以上海为中心，将会计师公会发展成全国性同业组织，而非仅仅局限于上海弹丸一地。这一设想明显有利于会计师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拓展，而非仅限于上海一地。而北京政府农商部对上海会计师公会的这一设想心有忌惮，明确三令五申要求其名称及业务范围必须严格限制为在“上海附近行使职务之会计师组织”。北京政府认为如果放任上海会计师公会成为全国性组织，一方面不利于政府的管理和约束。另一方面，一旦任其势力座大，势必尾大不掉，成为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全国性社会组织。此外，上海地处南方，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对立。如果允许上海会计师公会扩展成为全国性组织，必然会有利于掌控上海一地的军阀借此扩展势力，导致地方势力坐大，威胁中央政府权威。

经过了几番交锋之后，会计师公会筹备会遵照政府训令，对会章作出了一定的修改妥协。农商部随后批准了上海会计师公会的成立申请。在接到农商部的批示之后几天，即1925年2月21日，公会筹备会致函通知会员曰：“本公会修正章程业奉农商部批示第五号准予备案。现凝于三月十五日（星期日）下午二时开成立大会。另附送本会章程一份，入会愿书一纸。”^①会员的入会志愿书的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大致格式一般是会员承诺“兹愿遵守贵会章程申请人入会依照章程第六条之规定填具各款至希审查许可为荷。”^②自此经过一番波折，上海会计师公会于1925年3月15日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举成立公会职员管理日常事务，第一届职员“计徐永祚、吴应园、周增奎、童诗闻等五人为理事，郑忠钜、徐广涉等二人为监察。”^③上海会计师公会的章程一经确定后即成型，其基本内容经年累月也大致没有太大的变化。会议章程规定：本会以联络感情，交换智识，图谋会计师地位及德义之向上促进。吾国经济事业之健全发达及新会计事业之推进普及为宗旨；至于入会及出会，则明确凡领有国民政府实业部及以前主管各部发给会计证书之会计师欲在上海及附近地区执行业务者。应于开始执行业务前填具入会愿书连同所领会计师证书及半身照片送交本会；具体组织形式为常务理事会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会员的会费定一次性入会费三十元，会费为每人每月国币二元，会计二十四元。^④除此以外，还规定了会计师所应具备的专业操守，如未经客户同意不得泄露客户的机密等。此外相比于其他专业人士的职业团体，该会24元每年的会费价格已经很高了，大致相当于上海一个刚入职低级职员的月薪。这一方面说明注册会计师收入丰厚，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承担较高的会费，但另一方面也势必影响其会员规模，通过会费价格这一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机制控制会员准入，从而保持这一团体的精英水准。

会计师公会成立之后，就积极谋求同人的合作与职业共同体的建构。为了联络会员的感情，会计师公会特设了每月聚餐会，以同人聚餐会作为一种社交方式，加强职业共同体内部的有机团结。早在公会成立之初，就有会员提议会计师每月聚餐一次，由会员轮流做东。该会拟定会计师聚餐会办法规定如下：

^①《上海市会计师公会筹备成立、议订及修正章程呈请农商部等主管官署备案的文及其批复和召开会议的通知》，上海档案馆 S447-2-230，第62页。

^②《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入会志愿书（卷二）》，上海档案馆 S447-2-277，第2页。

^③《上海市会计师公会筹备成立、议订及修正章程呈请农商部等主管官署备案的文及其批复和召开会议的通知》，上海档案馆 S447-2-230，第68页。

^④《上海市会计师公会章程》，《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6年第60期，第14页。

(一) 目的：本会以联络全业感情，交换知识，研究学术，以期全业间有一致之精神，业务得充分之发展为目的。

(二) 办法：由会员互选干事四人，办理会中记录、杂务及收支款项等事，每次聚餐种类由前次聚餐时多数议决之。

(三) 期间，每月一次规定在月中左右，二三日之内申刻举行。

(四) 地点：由干事商定，于举行聚餐前五日通告各会员。

(五) 费用：每次聚餐费用由会员平均摊派，如会员因事届时不能到会，必须于聚餐前一日通知干事，以便预计座位，节省费用，但不得因故缺席而免除摊派。

(六) 会计：会员应于入会前预缴洋十元约为五六次之费用，费用告罄后再通知会员再缴十元备用……

(九) 演讲：每次聚餐各会员得自由或推举他人演讲下列各题目之一以助兴趣。(甲)关于经济与会计学之研究(乙)关于经济或会计之新闻。

(丙)关于帐务作弊之新闻或故事。

(丁)关于改革簿记之方法和故事。

(戊)关于发展业务之意见。

(己)关于外国会计师之沿革和故事。^①

聚餐会办法表明，公会设立聚餐会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全业感情，交换知识，研究学术，以期全业间构建一致之精神，使业务得充分之发展。除了同业之间互相交流、共享业务机会以外，也注重会计学术知识的更新与信息的共享，为此还专门在每次聚餐之际举行特邀演讲。

从1925年12月起开始举行每月一次的聚餐会。这一形式得到了会员们的广泛欢迎和热烈响应，每次聚餐的地点大致不定。如1929年第四次聚餐会纪事显示“到会人数共计十六人，未到会人数共七人。”并拟定“下次聚餐在戈登路五

^①《会计师聚餐会办法》，《上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年报》1929年第3期，第179-181页。

十九号王梓康公馆。”^①1932年会计师聚餐会第五十次聚餐纪事显示，聚餐地点为海关俱乐部，到会人数共计二十六人，未到会人数共十四人，来宾共五人，下次聚会地点则未定。^②除了会计师社团例行的组织联谊活动外，各会计事务所也经常举办例行聚餐会，如“立信会计师聚餐会第二次聚餐，已于本月六日中午假星五聚餐会举行”。^③

聚餐会的社交形式对联络同业感情，构筑职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与共同情感结构助益颇大。这意味着通过聚餐会等社交形式，会计师们将自己弥足珍贵的事业置于高亲密度的信任网络之中。通常参加聚餐会的会员是公会的资深会员或积极会员，所以每次聚餐会的规模并不大。许多公会的议题也是先在聚餐会上被非正式的提出，随后才在正式的会员大会上加以讨论。每月定期的聚餐会形式因而逐渐成为上海会计师公会的一项组织传统，并在随后的岁月里被渐次发扬光大。以至抗战胜利之后，会员重组上海会计师公会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恢复聚餐会这一优良传统。1946年11月6日，重组后的公会就表示“本公会复员已将一年，聚餐一事似有待于重组。”因此要“重行组织会计师聚餐会。”并且定于“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半在南京路慈淑大楼四楼举行首次聚餐会，欢迎同仁参加。”^④据聚餐会恢复后的《会计师聚餐会第一次纪事》显示，公会重组之后首次申请参加“本聚餐会之会计师共五十五人”。^⑤在得知聚餐会恢复的消息之后，一位公会的老会员葛家珍会计师事务所会计葛家珍欣喜若狂，当即表态“获悉组织聚餐会不胜赞同，本会计师愿意参加，特面请。”^⑥

众多莘莘学子，或在大学深造，或从高中及中等商科学校毕业，都纷纷涌入会计行业。会计课程的教授也成为了沪上一件颇为流行的事情。譬如，当年的《申报》上就刊载会计授课广告谓：“立信会计事务所，将于明年一月起，每星期二、四、六在大陆无线电台上午八时至九时播音教授簿记，约于个月内全部授完。”^⑦广播课程作为一种远程教育，跨越空间的阻隔，满足了更多无法亲临现场的学员的需求。而且随着工商事业的日益繁盛，企业的会计核算的诚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越来越关注会计师们出具的公司财务报表是否公正地反映了一个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会计师群体内部事实上也对这些专业问题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和聚焦。如在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发刊词》中就提出了以下职业操守原则：

凡从事会计师者，有不可不具备之要件三，一曰学识，二曰经验，
三曰道德。学识经验，例有国家法律为之明文规定。若个人道德，则非
徒恃法律所能维持于不敝。故于会计师法规之外，不能无同业公会以为

^① 《第四次聚餐会纪事》，《上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年报》1929年第3期，第181页。

^② 《会计师聚餐会第五十次聚餐纪事》，《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2年第24-27期合刊，第113页。

^③ 《立信会计师聚餐会讯》，《立信校刊》1947复刊第12期，第3页。

^④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举办这会计师聚餐会简则、记事录、收支帐目及有关函件等文书材料》，上海档案馆S447-2-98，第174页。

^⑤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举办这会计师聚餐会简则、记事录、收支帐目及有关函件等文书材料》，上海档案馆S447-2-98，第142页。

^⑥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举办这会计师聚餐会简则、记事录、收支帐目及有关函件等文书材料》，上海档案馆S447-2-98，第176页。

^⑦ 《立信会计事务所教授簿记》，《申报》1935年12月29日。

切磋琢磨之所。盖法规所以植其纲，公约所以详其目。必也纲举目张，交相为用，而后可以推行尽利之效。现今世界各国，莫不有会计师公会之组织，英国设立最早，加拿大、意大利、美利坚诸邦次之。法兰西、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德意志诸国又次之。日本号为后进，亦于大正十年追踪成立矣。统观各国会计师公会章程，其于取予收受之间，出入进退之际，大抵详加限制，不轻假借。盖内以砥砺其廉隅，增高其品格，外以恢张其信用，发挥其效能也。^①

从这段发刊词中可以发现，对于会计师而言学识尤为重要，这里的学识是指现代会计知识，从而与传统账房先生的会计实践相区别。其次则是经验，由于当时会计师职业尚是一社会新兴职业，历时很短，因而有经验的资深会计师更为匮乏难觅。最后则是道德，因为中国人传统上都持有“小胜以智，大胜以德”的价值标准，所以一个会计师必须德才兼备才能在社会上被广泛认可。潘序伦也认为会计师应以“其学识经验及才一能之所及，帐目之是非与确误，从直报告，毫无隐拘，且绝对不可敷衍塞责。苟非检查结果确有把握，决不为人出具证明书或鉴定书。尤应保守其超然独立之地位，不握政权，不营商业，不在与己身利害关系之事行使其职业上应有之职权，更绝不泄露职务上所得悉他人商业秘密。”^②并强调会计师皆应守身如玉，丝毫不肯苟且，方可良心上自安。

由于上海近代经济的发展，诸多商务都需依赖会计师来执行，甚至于原本交由律师或独立董事等处理的公司登记注册、公司监察、保险理赔等事务都根据政府命令转交会计师办理。譬如，企业雇用注册会计师的代价不菲，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聘潘序伦为常年会计顾问，每月报告一次查账情况，年终出具证明书或报告书，每月公费洋四百元正。每年 4800 元。^③因此，即使在 1938 年这样的非常时期，会计师的营业收入也是颇有保证的。由于国民政府迁往大后方，不再控制上海，因而对沪市有关查验公司资本及监督新公司创立等事项也作了具体规定安排，在上海市行政官署未恢复行使职权前，由经济部委托上海市会计师公会代办，报由特区法院法人登记。依据当时经济部训令“上海市会计师公会拟请在非常时期对于沪市公司设立登记，如委托会计师办理者，凡验资及监督创立会等事，得由受委托之会计师负责验明，并汇集各项应备文件。”“公司之设立由经济部委托上海市会计师公会负责查验公司资本，分别出具证书或签署于决议录。”^④

上海会计师公会自 1925 年成立后不断壮大，慢慢成长为上海主要的专业人士职业团体之一。会计师群体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在实现自身专业化、知识化的同时，也广泛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之中，并发出利益诉求。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亦推动着会计师职业的发展。现代化导向的国

^① 《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发刊词》，《上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年报》1926 年第 4 期，第 3 页。

^② 潘序伦：《会计师业概况》，中华职业教育社 1928 年版，第 16-17 页。

^③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帐目审查、代办企业注册、商标注册等文件》，上海档案馆 Q90-1-1499。

^④ 《沪市设立公司，会计师公会查验资本》，《文汇报》1938 年 7 月 27 日。

民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法律，确立了新的会计程序和准则，为大量年轻的财会毕业生提供了就业机会。30年代是上海会计师公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上海经济事业的发展，会计师队伍也渐渐壮大。据1936年的一份统计，上海会计师公会的会员人数达到了272人。^①到1939年3月底，约有330人左右。^②到40年代末，中间虽然历经了八年抗战，但到1949年3月为止上海的入会会计师人数达到709人，上海会计师人数占全国总数一半以上，冠居全国之首。^③面对上海将近500万的人口，有经验的财务人才相当缺乏，注册会计师更是万里挑一的人才。注册会计师职业群体的人数始终有限，由此彰显了会计师群体的中产阶级专业精英本色。

二、抗战胜利后上海会计师公会的重组

但是1937年抗战的爆发，打断了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上海会计师公会就此被迫中止组织活动。正如该公会在战后递交政府的报告中所指出，“八一三战事爆发，政府西迁，本会会所系在第一特区地方，故会务尚能照常进行。”然而随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会计师公会被迫中止活动，宣布解散。战中，汪伪方面始终希望恢复会计师公会，即“伪方屡次迫以整理复会，本会始终予以拒绝，并将会所房屋转租于人。”战争中期上海会计师公会迫于敌方压力，被迫中止了活动，并将会所转租他人。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全国百废待兴，会计师公会也希望能重新恢复组织，开展活动。抗战刚结束伊始的1945年8月，他们就向政府表示“曙光重现之初，我自由职业团体似应早日复兴。”^④

会计师公会恢复日常运作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重新收回战前财产，使其物归原主。公会筹备会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求，陈明“惟上项四所房屋已于本年四月初被日军向业主占用，迄今尚未收回。”希望政府当局向现有业主施加行政压力，帮助其恢复财产权益。在财产尚未收回的情况下，会计师公会只好暂且寄人篱下，宣布“即日复员照常办公，并借广东路93号3楼为本会临时办事处。”^⑤

与会计师公会希望恢复职业团体运作的愿望相一致。国民党也希望由政府主导，通过恢复公会来加强对会计师职业群体的政治控制和引导。1945年10月24日，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令指示“查本市会计师公会依照社会局《收复地区人民团体调整办法》规定应予整理，”并首次规定“指派奚玉书、何元明、潘序伦等九人为该会整理委员会委员。”^⑥1945年11月上海市社会局就会计师公会关于筹组公会的申请再次作出批示，并重申依据“社会部颁发收复地区人民团体调整办法之规定，特指派奚玉书、何元明、潘序伦、徐永祚……为该会整理委员。”^⑦奚玉书、何元明、潘序伦等人都是当时的社会贤达，且都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著名会计师。以上人等所组成的会计师公会整理委员会，表明国民政府的对非政府的职业团体的政治控制与渗透进一步深化。整理委员会在得到授权委派后，迅即开始了其卓有成效的工作。整理委员会先是召开会议商讨移交事宜，首先“组织整理委员会镌刻印记，文曰上海市会计师整理委员会。”随后“定本月

^① 《申报》1936年1月19日。

^② 《全国各地会员名录及发给会员证章名册（一）》，上海档案馆，S447-2-260。

^③ 《社会：上海市会计师登录（三十八年一至三月份）》，《上海市公务统计报告》1949年第6卷第3期。

^④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会计师公会筹组公会》，上海档案馆 Q6-34-623，第2-3页。

^⑤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会计师公会筹组公会》，上海档案馆 Q6-34-623，第3页。

^⑥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委派奚玉书等接收正理公会的令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办理会员登记进行接收整理等事项的报告公告会议记录申请登记会员名单》，上海档案馆 S447-2-232，第1页。

^⑦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会计师公会筹组公会》，上海档案馆 Q6-34-623，第11页。

7日下午(星期三)四时接受通知,本公会原任常务理事办理移交。”此外由于会计师公会的原会所业已被人侵占,尚未归还,因此会议议程还包括“查本公会原有会所房屋现将收回,未经迁入以前,在何处临时办公?”以及“请推员修订会计师公费标准案”等。^①在随后其对会员公示的整理委员会议程办法公告中则通告:议决新会员加入暂行手续;议定会员缴纳会费数目;会址问题;呈复社会局本会已成立;通知各政府机关如需聘任会计师,本会可协助代洽;会员月纳会费原为三元,今拟增至三百。^②

与之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下令办理会计师公会会员甄别登记事宜。这一甄别举措矛头直指曾效力敌伪的附逆会计师。1945年11月会计师公会筹组会曾就此议题专门致函上海市社会局,寻求相关的指示训导。在信函中会计师公会忐忑不安的问询“属会现正办理会员登记事宜,惟对于曾向伪组织领取会计师证书,或重行登录,或有附逆行为应如何处置?”^③希望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明确指示。对这一问题,社会局迅速做出了回复,在1945年11月29日致会计师公会筹组公会的回函中措辞严厉的指示:附逆或参加伪方,取消资格,例不准执行职务,以示惩戒。^④

迫于社会局的严令,整理委员会对于会员的甄别程序不得不十分严格,规定只有审查通过的会员才有资格复业。对于甄别注册的具体措施则规定如下:一、交验会计师证书,本会会员证书,填具登记表格;二、交常费两个月共计六百元。会计师申请入会手续如下,交验会计师证书,填具入会志愿书登记表,附上本人二寸半身照二张。^⑤经过这番严格的甄别和审查,并重新注册之后,才允许没有政治污点的会计师重新开始执行业务。

会计师公会经过严密的甄别审查之后,其日常运作已然被国民党政府完全掌控。抗日战争严重损害了公会的正常有序发展。巨大的财产损失,会计业务的凋敝,这一些都使得会计师公会的自治性质丧失殆尽,以至沦为上海市社会局的“属会”,仰人鼻息。当国民党新任社会局长吴开先刚一走马上任的时候,该会整理委员会立即通知倡议会员欢迎,“本月二十九日本是团体欢迎吴开就任社会局长,通知全体整理委员参加。”^⑥这一方面说明重组后的会计师公会与政府间的密切交往联系,另一方面则表明会计师公会和政府依附性的加强,公会自主性的减退。总之战后的会计师公会其声势已大不如前,可谓江河日下,一方面需要重新恢复财产,具体事例如“本公会房屋业经装修就绪,有一部分已经搬入。”另一方面则要为会员的经济业务权益等和政府据理力争,如请求修改会计师条例,取消地区限制,扩大会计师执行业务的地区范围,基于“关于会计师法规定执行业务区域之限制窒碍难行,本会除已呈请立法院呈经济部转呈行政院主席请求予以废除。”^⑦凡是种种,无不仰赖政府等公权力的支持与合作。

^①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委派奚玉书等接收正理公会的令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办理会员登记进行接收整理等事项的报告公告会议记录申请登记会员名单》,上海档案馆 S447-2-232,第19-21页。

^②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委派奚玉书等接收正理公会的令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办理会员登记进行接收整理等事项的报告公告会议记录申请登记会员名单》,上海档案馆 S447-2-232,第4-5页。

^③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会计师公会筹组公会》,上海档案馆 Q6-34-623,第14页。

^④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会计师公会筹组公会》,上海档案馆 Q6-34-623,第18页。

^⑤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委派奚玉书等接收正理公会的令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办理会员登记进行接收整理等事项的报告公告会议记录申请登记会员名单》,上海档案馆 S447-2-232,第12页。

^⑥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委派奚玉书等接收正理公会的令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办理会员登记进行接收整理等事项的报告公告会议记录申请登记会员名单》,上海档案馆 S447-2-232,第26页。

^⑦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委派奚玉书等接收正理公会的令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办理会员登记进行接收整理等事项的报告公告会议记录申请登记会员名单》,上海档案馆 S447-2-232,第26页。

国民党政府借助于由会计师公会上层人士所组成的整理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通过一系列对会计师的甄别、审查，终于在 1946 年 3 月召开会员大会宣布重组成功。会计师公会在战后的重组很大程度上是国民党政府在幕后推手而促成的。如前所引，国民政府上海市社会局在 1946 年 2 月密令要求会计师公会于三月底前限期成立。在这一方针政策的指导下，1946 年 3 月 6 日，上海会计师公会通知其会员，“兹定于三月十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在中正东路浦东同乡会六楼礼堂召开会员大会，讨论修正章程，选举理事、监事。”^①在随后 3 月 10 日召开的会员大会中，公布了重组后修订的公会章程，该章程新增加“章程修正之点，增加会员共同利益。修正会费及其常费”。直至此时，会员大会公布的重组后会员人数为 200 人。^②与战前 272 人的会员总数相比较，战后重组的会计师公会会员人数略有减少。这固然是由于战争对会计师职业群体的侵袭与损害，但也从反面证实了会计师公会的组织凝聚力已大不如前。昔日合众为一、共同发展奋进的职业共同体至此土崩瓦解、随风而逝。

三、救亡图存与民族主义诉求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很大意义上被视为是一场“西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今日所见的现代化，是从西方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对于非西方世界，这种现代化不具备没有文化上的道统与合法性。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近代上海的会计师职业群体兼有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双重属性。与科举时代农业文明培养的知识分子不同，新式学校是工业化培养知识分子，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是面向市场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如大学教授、律师、会计师等等。

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国内各阶层精英无不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并力图唤起民族情感。这些民族主义的话语论述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然究其本质而言，它们大都代表了一种冀图在失范的和混乱的近代中国寻找归属感的渴望。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接受西式教育的城市精英，自由职业群体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却充斥着大量不求甚解的西方价值理念以及对西方思想资源的不心知其意的工具性应用。这一矛盾犹如康拉德小说中一个角色的话：第一次东出苏伊士运河时，此人感慨道，“东方向我说话，但发出的却是西方的声音。”^③就此而言，民族与民族主义完全是现代的观念。上海专业人士的城市民族主义出色地捕捉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复杂性——既是西化的，又是反西方的。

以此为研究切入点，既往的研究对民国上海会计师公会的研究中认为上海会计师公会的政治活动十分有限，会计师群体对民族主义等政治议题漠不关心，其全部的注意力都只聚焦于自身职业地位的提升。然而本文通过对上海会计师公会档案的研究分析发现，事实似乎是相当复杂的，诸多的事实证明作为城市中产阶级精英的会计师群体对民族主义等议题的兴趣并不小。而且随着上海经济的繁荣发展与自身经济地位的日渐提升，这一群体的政治参与度明显提升。甚至到抗战后，尽管会计师群体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打击，其政治热情依旧不减。

早在会计师公会创立之初的 1925 年，该公会就对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予以同情与帮助声援。五卅惨案爆发仅一月之后，会计师公会根据理事提议，要求对“对于五卅惨剧欲求公理之伸张”。会计师公会尤其愤慨于外国传媒对五卅惨案

^①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会计师公会筹组公会》，上海档案馆 Q6-34-623，第 22 页。

^②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会计师公会筹组公会》，上海档案馆 Q6-34-623，第 24 页。

^③ 参见吴主助主编：《海洋文学名作选读》，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3 页。

的肆意造谣诬蔑与妖魔化宣传，因为“此案发生以来，外人多以赤化排外相语意，混淆黑白。”^①为了揭穿外媒对五卅惨案一边倒的偏向性宣传，会计师公会认为“有两事亟需办理，一曰编布五卅惨案真相记。”^②会计师公会意识到如果要破除外国媒体对五卅惨案带有偏见的导向性宣传报道，首先就要中国方面迅速应对，占据话语霸权和事件的解释权。因为会计师们了解在西方国家，真正的威胁来自公众舆论。某些大众偏见也使得人们更容易相信特定的报道，而这些故事又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具有的偏见。对于惨案的具体建议意见，会计师公会先是建议各方协作募捐善款救助血脉相连的受害同胞，希望“以募捐论亦以各方合办乃能收统一的经济的效果。宜组织一种机关或即名为救济五卅惨案经济委员会。”并且提议“以总商会为中心，并由各公法团推举代表加入共同组织。”对于救济善款的具体分配和用途，则应明确“捐款即应救济工人，除此以外不得挪作它用。分配标准，分发程序等等皆由委员会详加研究，通盘筹划后正式议决。”^③显然，初创伊始的上海会计师公会自认羽翼未丰，尚不具足够的社会影响力与知名度。

五卅惨案爆发后，上海各界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市民组织如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声援这一反帝爱国运动。在工商学联合会以外，上海市总商会、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等也纷纷慷慨解囊、施以援手。鉴于以上各公团组织活动都是临时聚合而成的，其内部会计帐务混乱不堪，毫无头绪可循，因此迫切需要专业性的会计师组织代理义务理账，提供专业服务。会计师公会的领导者们就首先产生这一认识和觉悟。1925年6月25日，会计师公会就此召开理事会议决议此事，最后通过决议表示，“本月二十二日理事会议决，对于五卅惨案援助一案内开公函。各公团凡有关于五卅案内应行计算鉴定或查核证明各事项，如拟聘会计师担任时，请先向本会委托。由会指定会员义务承办。”并且鼓励号召广大会计师会员积极响应，并宣布“会员如愿担任此项义务请先函报本会登记以便遇有委托可以指定。”^④此后理事徐永祚于1925年7月17日再次来函呼吁会计师公会上海各市民团体予以专业理账服务，徐永祚称“阅报载上海临时济安会广告请各公团派人监督发款等语。”并认为“本会为会计专门之职业团体，允宜尽兹义务，庶几相得益彰。”^⑤在接到徐永祚等资深会员的申请之后，会计师公会再次重申支持这一提议。嗣后该公会向上海各志愿性市民团体发出倡议，声明五卅运动为一全国性爱国运动，“凡属国民人人有援助之责，敝会员即为国民一分子，似应尽吾所能，聊资援助。如有关于此案会计事项委托者，敝会员谨愿义务受理。”至于提供会计义务服务的具体承担者则“应由承办者署名负责”。^⑥在屡次申明会计师公会愿义务提供会计核算服务的同时，鉴于会计师踊跃申请义务服务之热烈气氛，除宣布“本会愿尽义务承办五卅案内会计”外，也订下具体操作细则，尽量满足安抚会计师的拳拳报国之情。如规定承担义务之会计师的遴选必须“用抽签

^①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募捐款帐目第一次报告书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对五·卅惨案的建议意见及受委办理案内会计事务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 S447-2-58,第 30 页。

^②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募捐款帐目第一次报告书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对五·卅惨案的建议意见及受委办理案内会计事务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 S447-2-58,第 32 页。

^③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募捐款帐目第一次报告书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对五·卅惨案的建议意见及受委办理案内会计事务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 S447-2-58,第 31 页。

^④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募捐款帐目第一次报告书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对五·卅惨案的建议意见及受委办理案内会计事务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 S447-2-58,第 61 页。

^⑤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募捐款帐目第一次报告书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对五·卅惨案的建议意见及受委办理案内会计事务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 S447-2-58,第 85 页。

^⑥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募捐款帐目第一次报告书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对五·卅惨案的建议意见及受委办理案内会计事务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 S447-2-58,第 92 页。

法抽定次序，遇有委托事件，依次承办”。^①为了公平起见，采用抽签法抽定次序，不仅安抚了未被遴选上的会计师的爱国热情，也体现了公会作为一职业团体对于会计师个人的凝聚作用。

对于新创立的上海会计师公会愿义务提供专业会计服务这一爱国盛举。其他各社会团体也是纷纷予以称赞和期许。如上海总商会就于1925年6月26日来函，勉励会计师们的爱国义举，盛赞“贵会诸君爱国爱群，赴义恐后之盛意感佩莫名”。并主动请求提供服务，宣称要共襄盛举，“嗣后如有闻于上列事项应请会计师办理时，谨照贵会来函办理。”^②新创立的会计师公会在受到其他前辈社会团体的夸赞之后，也渐渐培养起了自信，开始积极融入上海社会并与上海其他民间社会团体串联，互动，俨然成为沪上一股新的社会力量。与上海总商会相仿，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也主动与会计师公会接洽联络，共商应对五卅运动的统一对策，谋求进一步的合作机会并采取共同行动。如7月3日，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致函回复上海会计师公会的来信表示“贵会吴会员建议拟编五卅惨案真相记及组织五卅惨案经济委员会，征求敝会同意等因由。”嗣后表态对会计师公会会员的提议“余深佩服，经敝理事会议决于第一项推定童诗闻君为代表与贵会接洽办理。”^③以上这些事实表明，上海会计师公会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成立伊始就积极参与民族主义运动，并在运动中拥有了自己独立的话语表述。

然而在志愿提供会计核算服务的同时，会计师公会很快就切身体察到了中国传统簿记的混乱不堪和错误百出。会计师们基于满腔爱国热情，表示“本会议决对于五卅案会计事项义务受理，籍资援助，则本会同人对于五卅案会计事项似均有贡献义务。”但是随后具体参与会计服务后才发现“各公团收支报告殊觉稍欠整齐。而有改良为要。”^④自6月底自愿承担义务查账之责后，经过两个月的清算核查后，会计师公会也颇为无奈的抱怨，“各会员报告会谓各公团会计科之簿记组织及收支办法多有不完备之点，以致检查帐目甚感困难。或竟无从着手。拟请分函各公团先行设法改良簿记组织，并妥定收支办法以为整理会计之准则。”嗣后，会计师公会更是呼吁各职业团体在请会计师查账前，应先自行设法改良簿记，规范具体收支，做到合理化的数目字管理，最后更声称必须取得进步，“否则殊属难于承办等语”。^⑤

会计师公会在五卅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与参与，都预示着会计师群体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在运动中，会计师作为城市精英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作为中间组织的会计师公会积极发挥社会作用，而不只是代表自身特别利益的组合。随着1930年代起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这一民族主义诉求愈加强烈。如早在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之际，上海会计师公会就曾主动联络上海各社会团体，就讨论反日之具体方针及对日经济绝交等问题起见，共商对策“特订于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二时假总商会招待本市商业团体交换意见。”^⑥这一举动表明

^①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募捐款帐目第一次报告书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对五·卅惨案的意见建议及受委办理案内会计事务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 S447-2-58，第81页。

^②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募捐款帐目第一次报告书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对五·卅惨案的意见建议及受委办理案内会计事务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 S447-2-58，第68页。

^③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募捐款帐目第一次报告书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对五·卅惨案的意见建议及受委办理案内会计事务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 S447-2-58，第73页。

^④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募捐款帐目第一次报告书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对五·卅惨案的意见建议及受委办理案内会计事务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 S447-2-58，第48页。

^⑤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募捐款帐目第一次报告书及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对五·卅惨案的意见建议及受委办理案内会计事务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 S447-2-58，第130页。

^⑥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

明会计师公会很早便已开始关注民族危亡议题与日本的对华威胁。

到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上海会计师公会又为应对民族危机，专门开会商讨对策，公开表示“日兵侵占东北，凡我国人同深深愤慨。公会除推举代表参加全市抗日救国会之共同工作外。”为此需商讨具体对策应对，特于“本月八日召集紧急执监联席会议讨论抗日救国会具体方针”。^①会计师公会还公开鼓励会员积极倡言国事，贡献自己的智慧，发表建议。这一倡议得到了会计师们的热烈响应。1931 年 10 月 17 日，会员连启泰就来函请求“此次日本肆虐侵袭，国人愤慨誓死与之周旋、同仇敌忾。”并积极献言献策“为宣传起见，提请贵委员会搜辑一切关于此次日本暴行文件并各种方案加以编次发印抗日救国专刊。”^②会计师公会的民族主义诉求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在全民抗日的热潮下的自然反应。如同一年的 9 月 26 日，上海召开了由 800 余个团体的代表和 20 余万市民参加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督促蒋介石武力抗日，要求分裂的国民党摒弃私见，一致对外。^③

在 1932 年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后，与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在 1932 年和 1935 年之间上海会计师公会几乎没有任何动作的结论不同。会计师公会在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刻意保持所谓低调。如 1932 年“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仅几天后的 1 月 31 日，会计师会员们自觉自动发起爱国募捐“自日人无故侵犯以来，会员已于上月三十一日自动捐助十九路卫国军费四百两。”^④第二天即 2 月 1 日，上海会计师公会又召开紧急执监联席会议，商讨危机应对事宜，会议当即议决“在建筑会所基金项下拨洋三千元援助前方将士等因。”为了方便这一款项的及时支取，以免繁琐的转账程序延误抗战大事，又由会计师公会出面“向通易信托公司磋商在活期存款内提取洋三千元提交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并转交国华银行交十九路军军需处。”^⑤3000 元并非一个小数目，即使平素财力不俗的上海会计师公会一时也没有充足的储备现金（现金流）来周转支付。为了救援国难，支持前方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会计师公会并没有拘泥于自身组织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正在营建中的会计师公会会所的施工进度，临时从建筑会所基金项下拨洋三千元援助前方将士。最后，全部募捐款项包括“自动捐助十九路卫国军费四百两。复由本会公款项下捐洋三千元，又聚餐项下捐洋一百元。”这三笔款项汇集在一起，嗣后统一募捐支持十九路军。由此可见，这种舍小家顾大家，身国一体的意识观念，是近代中国中产阶级专业精英的普遍维度和面向。在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和行为的背后体现了会计师们作为城市精英的社会责任感，即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除了倾尽全力，紧急予以经济援助外，公会的资深会员，资深会计师江万平更有感于“十九路军将士奋力杀敌，经大小数十战，连挫敌锋”的英勇壮举。^⑥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诚，乃提议“吾会应紧急通告全体会员每日

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上海档案馆 S447-2-60，第 1 页。

^①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上海档案馆 S447-2-60，第 6 页。

^②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上海档案馆 S447-2-60，第 11 页。

^③ 陈觉：《国难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90 页。

^④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上海档案馆 S447-2-59，第 6 页。

^⑤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上海档案馆 S447-2-59，第 1 页。

^⑥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上海档案馆 S447-2-59，第 3 页。

余一小时穷搜方针以应对危局。”^①在呼吁会计师会员们每人自觉为国家谋划应对危机之对策之余。又思量当日正值寒冬，前方将士缺少御寒衣物，为此又特别发出倡议“又募得丝棉背心一百件”“共计丝棉背心三百件，务请查收，即行送呈前线。”^②与之同时，国民党政府也试图将上海各社会团体支援前线抗战的义举囊括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显然国民党当局不想失去自身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导权，并试图按照自身“党国一体”的既有意识形态范式来塑造上海民族主义运动的话语论述。为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务委员潘公展于1932年3月31日致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上海律师公会等职业团体，信函中指示鉴于“前方抗日将士冰天苦战……市党部亟需领导民众团体预备御寒物品或食品”。并交待所有职业团体在接到指令后应“即领导民众团体着手筹办，但一切开支需节省，不得浪费”。为了商讨具体事宜，特邀请“上海市各界慰劳抗日将士委员会聘请各界人士担任委员……于本月三十日召集工商学各界代表商议。”^③

在会计师公会对前线抗战表示支持的同时。公会的会计师会员也不甘落后，纷纷为抗日御敌出谋献策。一位会计师会员就有感于“此次暴日犯境，举国激愤，凡属国民自应协力。”建议为防备日方使用生化武器，应赶制防护装备。据他介绍“阅报闻，日寇已有施用毒瓦斯之装备”，鉴于前线将士身处险境，为了防备于万一“应备防护装备以保生命”。该会员又听闻“同志顾锡元君制成面罩一种”，认为“确有防毒之效用。每只公费计一元四角，现正积极赶制，以备输送前方。”^④

会计师公会不仅自身积极参加民族主义运动，而且还与上海的其他专业人士团体交流互动。上海律师公会在1932年战事爆发后曾为向国际社会宣传上海军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专门出版英文国难特刊以此以正视听，反驳日方利用其话语霸权对上海抗战的肆意造谣诬蔑与欺骗性舆论宣传。同时也利用这一良机，向国际社会宣传上海抗日的事态发展，争取国际友好势力的同情。律师公会并向会计师公会请求经济补助。在得悉这一消息后，会计师公会当即召开会议决应允给予资助，并在回函中表示“贵会编印英文抗日宣传刊物集资筹印征集敝会予以补助一节，曾经提出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补助洋一百元等，因记录在卷，兹附同上海银行支票一纸计洋一百元送请。”^⑤在英文国难特刊发行后，律师公会为表感谢特意致函上海会计师公会，赠送该特刊。会计师公会迅即在回函中致谢表示“英文国难特刊百册为对外宣传之唯一创作，自当分赠会员以广流传。专此奉覆及鸣谢。”^⑥

即使在淞沪停战协议签订之后，会计师们的民族主义怒火仍然没有平息。如1932年11月15日，该公会就曾致电中央，表示最近“报载平协议与伪满通车通邮”，恳求“中央对外方针决以不损害主权为原则”，并对接下来华北复杂的局势甚感忧虑，向南京国民政府表示“但闻华北风云仍属混昧，国人疑虑未消”，

^①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上海档案馆 S447-2-59，第4页。

^②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上海档案馆 S447-2-59，第6页。

^③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上海档案馆 S447-2-60，第3页。

^④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上海档案馆 S447-2-59，第12页。

^⑤ 《上海律师公会以编印英文宣传抗日刊物请予补助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2年第24-27期合刊，第41页。

^⑥ 《覆上海律师公会赠送英文国难特刊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2年第28-29期合刊，第15页。

力谏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据理力争，决不退让。^①为了更好的整合民族主义运动，会计师公会也积极参加上海各社会团体所组成的联合救亡团体如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等组织。然而也应看到会计师公会对于民族主义运动的热情是有高潮起伏的。如 1932 年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改选之际，会计师公会就表示“贵会此次改选，敝公会当选为常务理事，指派代表一人担任职务一节，曾经敝公会提出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本会代表尚未推出，暂缓参加。”^②很明显公会以与会代表尚未选出的借口，婉拒了这一邀请。但是与此同时，救国联合会致函恳请会计师公会义务查账，信函中表示“本会前三个月支付账目亟待公布昭示大众，经常务理事会会议，应将各项单据及报告委托会计师公会代为义务查核。”^③与前一次相同的是，会计师公会这一次又积极回应了救国联合会恳请义务查账的请求。

以上这些活动说明了会计师公会的民族主义活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在一时事态危急下的临时之举。对于国民党政府积极介入主导民族主义话语论述的举动，会计师作为既得利益者也积极与政府配合，因为他们深知自身的利益系于这个政权，而不是系于其对立面——政治改革者。如 1933 年，上海市政府组织的国难捐款统一委员会就向会计师发出邀请，请求其推代表参加，在其邀请函中表示“援助抗日将士及救济被难同胞组织统一募捐机构一案前经本处两度召集各机关各团体代表会商，经一致议决组织上海市国难捐款统一委员会，并订定该委员会章程十二条在案。兹依据章程第二条之规定应请贵会即日推派负责代表一人共同组织成立，并希望于本星期以内代表姓名公示寄交大陆商场三百零六号以便定期召集成立大会，相应检同章程一并函达。”^④在这一明确的暗示下，会计师公会主动参加了国难捐款统一委员会。事实上会计师公会主动参加民族主义运动不仅只是曲迎政府的奉迎配合，同时也是广大会计师会员集体心态的外露表现。如在 1933 年的一次例行会议上，会员徐鼎就提出一项临时动议称最近“最近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阻止国联与我国经济合作。”面对日本对华的步步紧逼，建议会计师公会应向政府施加压力，即针对“彼坏九国公约，危害世界和平，本会应以会员大会名义电请政府坚决行为，表示与暴日决不妥协。”^⑤虽然这一提议最后未被采纳，但是会计师们的激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则由此可见一斑。

1937 年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后，会计师公会仍然一如既往的支持抗日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会计师公会是更加主动地介入民族主义运动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强调与其他上海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团体的互动与合作。如 1937 年 10 月 27 日，公会就致电上海律师公会，表示“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在比国开会，本会拟联合各自由职业团体对该会议有所表示，以正国际视听，特于本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在高乃依路三十号本会会所开会商讨。”^⑥为了表明事态紧急、刻不容缓。两天之后的 10 月 29 日，会计师公会再次致电律师公会表示“兹定于本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在高乃依路三十号本会会所召

^①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上海档案馆 S447-2-59，第 16 页。

^② 《覆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以代表尚未推定暂弗参加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2 年第 24-27 期合刊，第 35 页。

^③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请推员查帐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2 年第 24-27 期合刊，第 35-36 页。

^④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政府组织国难捐款统一委员会请推代表参加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3 年第 35-37 期合刊，第 8 页。

^⑤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会员提议案（卷三）》，上海档案馆 S447-2-36，第 31 页。

^⑥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上海档案馆 S447-2-60，第 38 页。

集本市各自由职业团体第二次会议商议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及中央文稿。”^①言词恳切地再次催促律师公会以国家民族为重，务必参加这次会议的商讨，以昭显上海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集体心态与民族主义诉求。

会计师公会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与它自身的会计师会员们的理念相一致的。甚至直到1939年上海沦陷之后，会计师公会身陷租界孤岛的险境之中，自顾不暇之际，其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没有丝毫的退让。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1939年会计师公会的一名普通会员朱介人突然被日军逮捕，会计师公会在此过程中多方斡旋公关、设法搭救脱险。事情的具体细节如下，在朱介人被拘捕后，其家属立即致函会计师公会请求援救，据家属陈述“本年九月十四日突有日本宪兵部将外子传至虹口询问有无参加黄砂石子公会等情事，外子一再表白，随后释放”，谁料时隔不久“本月九日上午又有日本领事馆方面会同捕房将外子拘捕羁押。”^②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认定朱介人有抗日的嫌疑，所以才出面要求巡捕房予以协助拘捕。然而来自朱介人家属的说法却是与之相反的，11月14日，其家属朱潘丽娟女士来函称“外子朱介人向在本市执行会计师业务，平素安分守己，岂料本月9日上午四时突被拘捕，现羁押在中央捕房”。^③在此且不论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朱介人以抗日的嫌疑被拘捕是个不争的事实。在这样于己不利的情势下，会计师公会并没有选择明哲保身、置身事外。而是公开承认“证明朱介人会会计师确为本会会员”。并要求租界当局协助“请予释放”。^④在随后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信函中，会计师公会又再次确认朱介人会会计师为该会会员，请求予以释放。正是在会计师公会的全力斡旋下，最终朱介人会会计师安然无恙、被予以释放。

与其他专业人士团体略有不同，会计师因为深深介入商业事务中，其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热情似乎不高，会计师们仍然比较顾虑在商言商的经济利益需求，对此持实用主义的价值判断。例如面对银行等企业的对日绝交举措，公会的立场似乎是并不赞同的，“近闻银行公会或有因国事停止放弃者，以致商厂周转不灵。”“本公会通函上海银行公会解释慎重放弃，因为信托重要之原则。然此次国家有生死关头之过渡，事出非常，吾人以非常反应报之。”^⑤在会计师公会看来，单纯地抵制日货或对日经济绝交是颇不明智、因噎废食的举动，不足效仿。

会计师群体的民族主义诉求在这一时期不时地表现出了，这种民族主义诉求同时也是和当时中国的危急形势相始终。会计师公会适时地融入了这股民族主义浪潮之中，会计师群体灵活运用自己的财务专业知识和技能，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作用。

余论

总而言之，记账方式的知识转型催生了一个崭新的会计师职业群体。会计师作为一新兴专门职业出现在近代上海。上海这一城市的西化特质与现代部门的成

^①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上海档案馆 S447-2-60，第 39 页。

^②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上海档案馆 S447-2-59，第 18 页。

^③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上海档案馆 S447-2-59，第 20 页。

^④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上海档案馆 S447-2-59，第 23 页。

^⑤ 《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上海档案馆 S447-2-60，第 18 页。

长给予了会计师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而政府与会计师公会的关系则是复杂微妙的。一方面国民政府与会计师公会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国家构建与现代化导向。另一方面，致力于“构建现代国家”的国民政府需要将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向下延伸，即曼所说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向基层社会（主要是乡村地区）的扩张、渗透。国民政府通过对作为上海中产阶级的精英团体——会计师公会的管制，展现出一种国家（精英）控制型公共性。这种民族国家力图整合社会中层组织的行为非完全被动的自上而下完成的，而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产物。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曾浸淫其中。

须强调的是，民国时期伴随城市中产阶级而成长各类中层组织并非是西方“公民社会”这一理念型的不完美映射或者复本。应该承认有不少西方研究者依靠着理想类型推理（ideal case reasoning）认为，民国时代一个代表新颖、新式独立中层组织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城市里开始出现，并将这种日益发展的协会自治生活视之为中国社会西方化的表征，在他们眼中，太平洋西岸的那个历史存在，甚或就是西方自由和民主的历史合理性的一个“证明”。^①他们认为，通向现代性的道路最终只有一条，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自由（由西方定义的）。与以上现代化论者浅薄的乐观主义和“完美乌托邦”意识相反，现实可能是中国人会有中国自己的道路，在这条现代化道路中我们将看到世界命运的影子。本研究考察发现，与西方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也就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发展不同。民国时期的中层组织，尤其是那些中产阶级的职业协会，所呈现的并非是愈来愈强的西式“自主性”（或对公共权力的批判），或者是哈贝马斯理想主义中与国家相分离的“完全自主性”的公共领域，而是一种国家与社会“互嵌”的网络形态。而这种社会实在却恰恰与深嵌于固有文明中之一元宇宙观——天人合一，是相合的。在这一宇宙观下，“天”与“人”同归一贯，天人之间，亦无隐现分别。在社会领域中，新型的活动、意识和话语都可以在不直接影响中心的情况下获得发展。显然这种关系并未建立在原则性的、形而上学的个人主义的观念之上，或者建立在作为两个独特本体论实体的国家与社会的原则性对抗的基础之上。随着经济殷实、有较强购买力的中产阶级的增长，他们努力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诸如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的发展，通过持续结合民间力量，担当着联结公与私的责任，从而使微观的诸社群成为大型共同体中价值的若干个中心，以此来把个人与整体（国家）联系起来。由是种种展现了一种尊敬、服从官方权威的国家（精英）控制型公共性。这种管理型公共性根源于社会文化结构中，一直缺乏公民意识、共同体社会契约，缺少法律保障和个人权利亦是一个重要的局限，任何的活动与社团组织根本无能自治运作，只有依赖上位统治者强势的管理。它们与国家间的关系呈现一种共生的功利和策略性倾向。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例，其在国民党“构建党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多采取走走跟跟，若即若离的态度，甚或是采取一种见风使舵的社团机会主义立场。可见相较三民主义之意识形态规训，城市职业人士的中层组织更加关心眼前的现实利益，而拒绝信仰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这种对实用性的强调，有力地支持了公众领域非政治化的趋向。他们选择服从，这与价值观无关，反与实然的政治环境颇为吻合。它们不太

^① 这种弥漫于西方学术界的乐观情绪和道德优越感，其理论背景即“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根源于19世纪末期欧洲社会理论家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马克思·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人的著作。这些学术先贤的著作建立了一系列概念（比如，身份契约、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礼俗社会/法理社会、魅力权威/理性官僚权威等）企图描述人类社会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中发生的社会规范和关系的变化。他们主要根据现代化早期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经验，试图总结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强调意识形态的价值性功能，而是强调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的作用，因而他们的行为是功利和策略性的。这种情况与中国人特别尊重合法的国家权威是一致的，同时也与他们应当服从权威的信念并行不悖，这种信念世代相传。而利维坦在其国家主义管理和发号施令的伪装下看似强大无比，然而机敏的人却知道如何冲破这层面纱，国家的可渗透性造成了机会主义的畅通无阻。

与之同时，近代国家权力与中层组织的关系也并非仅仅只有对抗、冲突的一面，更是一个反复协商、讨价还价、相互共生的过程。或者按照伊文思的观点所指称的，国家并非以专制权力来控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则呈现出“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①遵循波兰尼的观点，我也把国家看成是“嵌入社会之中”，并随着不同的领域而拥有嵌入化的自主性。这种嵌入性随着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而变化，直到“国家”在微观层面（地方或社群）上最终溶解到社会的网络中。这种不均衡的嵌入性，使得国家对不同议题中涉及的不同社会部门与社会利益显现不同的面目，从而展示出大相径庭的公共性。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依照距离权力中心远近的关系嵌入，达至社会对国家的渗透，国家的强弱权力则是根据国家自身的不同部门以及社会参与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在伸张权力的社会运动过程中，日复一日的讨价还价犹如水滴石穿，在看似无形间扩大了权力的范围。它们不仅只是常态社会的一种力量表达，更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一种机制和管道。中层组织是集体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具有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及包容不同意见的能力。这些中间团体的代表，常常以协商的角色被吸收进国家的不同机构，起初这种利益表达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但随着社会力量的不断增长，与它们的协商便形成日常化（虽然不给予这些法团自治性、担当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一点正如查尔斯·蒂利曾指出的：“从长远来看，政府能力和受保护协商的增长，是相互强化的。一方面，国家的扩张导致了反抗、讨价还价和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受保护协商要求国家介入调停，从而激励了国家的扩张，继而促进了政府能力的增长。”^②但是也要注意蒂利的这一观点是从西欧北美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而西欧北美所呈现的强国家与强社会相互强化、促进的历史经验无法完全复制到西方以外的国家。与西方社会所呈现的国家与社会协同并进、相互促进的发展结果相反，近代中国之国家与社会却越来越呈现出国家权力的一元化发展轨迹。也就是蒂利所说的政府能力的发展先于、快于受保护协商这一极端，其结果必然途经一种威权主义。^③抗战后国民政府强化对民间社团的控制，各种各样的民间社团包括自由职业团体的逐步体制化，将公权力活动加以正当化，进而成为官方许可的、由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国民政府采取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利益代理体制来管理社会组织 and 团体，使社会中有限的利益得到表达。展现出的国家控制型公共性，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国家完全将“公”的表达资源霸占的前提下，力图展现其公共性的中层组织只能在依附于“国家之公”的框架下才能展开行动与表述，从而呈现出国家（精英）控制型公共性。

因此，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例，近代国家与民间组织协会的关系呈现为对抗与合作兼有、制衡与互补的共生机制。广泛的、多样化的组织协会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缓冲层，让社会参与政府作为，从而弥补了国家资源有限的困难。就更大的层面而言，近代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现代国家的建构。通过对上海会计师公会的考察，见证了民国时代，在西方影响下，现代国家

^①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美】查尔斯·蒂利著，陈周旺、李辉、熊易寒等译：《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第240页。

^③ 同上。

权力（尤其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与新兴社会权力这两者的共同生长、进而创造一种共有性社会结构的历程。